

增補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六

陇上学人文存

张学军 卷

张学军 著 李朝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张学军卷 / 范鹏, 王福生总主编 ;
张学军著 ; 李朝东编选.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226-05050-7

I. ①陇… II. ①范… ②王… ③张… ④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①C53②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7335号

出版人：王永生

责任编辑：贾文

封面设计：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张学军卷

范鹏 王福生 总主编

张学军 著 李朝东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7 字数 332 千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978-7-226-05050-7 定价：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陆 浩 刘伟平
主任：励小捷 咸 辉
副主任：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员：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焰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咸辉		
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鹏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朱智文	安文华
	张亚杰	李树军
		高志凌
		王福生
		刘进军
		陈双梅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五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林 铎
主任:	梁言顺	夏红民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彭鸿嘉
委员:	管钰年	王永生 王福生 朱智文
	安文华	马廷旭 王俊莲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琏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 范 鹏 王福生
副总主编: 马廷旭

总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从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人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 1990 年卷，1990 至

2000 年卷) 的编辑出版工作, 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 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 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 《文存》年出十卷, 到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 则从 1949 至 2009 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 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 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 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 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 百卷巨著蔚为大观, 《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 传之后世, 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 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 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 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 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 年 12 月 26 日

编选前言

这本集子，是张学军教授五十多年教学和科研的结晶，反映着教授的思想追求、性格品质和满腔热血的爱国情怀。

张学军教授生于 1935 年 12 月，出生地是东北吉林省大安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他自懂事以来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见过解放军后，他把父母起的名字“学君”改成“学军”，以此表明心迹：学习解放军，为祖国为人民贡献一生。1955 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一年后公派留学苏联，在列宁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哲学系学习。这期间，姐姐从国内去信说：“你现在到了天堂，应该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他回信说：“这里也不是天堂，有穷人、有小偷、有酒鬼，有许多二战造成的单身家庭……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大地上建设天堂。”这信被他弟弟（当时在清华大学学习）看见，就在同学中说了此事，1957 年反右时险些被划成右派。1960 年张学军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当时很兴奋，抱着满腔热诚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没想到回来后都要参加反修防修学习班，批判《一个人的遭遇》《第四个》等苏联电影，并让每人都发表感想；还让大家参观自 1957 年以来大学生写的大字报，并表明态度。他觉得国内气氛很紧张，要小心谨慎。同年 9 月，按照“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他来到了甘肃师范大学（现西北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从此和师范教育结下了跨世纪的终生缘分。

这时正是“困难时期”，组织上号召要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粮食供给量减为二十来斤，还得用柳树叶充饥。这个时期，一些同



志常常问他在苏联的生活，他就如实陈述，如说苏联的食堂，主食不要钱，只买菜就行了；还说过“我们的事情搞的很‘左’，这都是苏联犯过的错误，为什么我们还要犯呢？”“我们口头上坚持唯物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完全正确，个人崇拜会给国际共运带来麻烦”；在教研会上，他和别人争论，“‘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著’（当时他不知道这是林彪说的），那毛泽东思想从哪里来的，不学马列著作，怎么能懂得毛泽东思想？”这些言论都被汇报给总支（这些言论，在“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批了10年）。1962年党内小整风，他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停止了他担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让他去准备讲授欧洲哲学史。这就使他和西欧哲学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在甘肃各高校开设最早的欧哲史课程。

在学习、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马克思对西方哲学家和哲学学说的评价。马克思评价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时说，他们是历史上的巨人，他们除了个人的优秀品质和能力外，主要是他们能够不受统治阶级的局限，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又说，人文学者，应该像狄德罗那样，将一生贡献给真理和正义。张学军教授受到启发，把马克思的话，当作研究学问、进行科研的终生目标和方向：超越阶级与执政者的局限，把一生献给真理和正义；站在历史进步和人民立场的高度，审视一切事物和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这不仅成了他做人的座右铭，而且成了他教学和科研的指针。所以，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厘清旧观念，探索新思路。

他在主编《西欧哲学史稿》一书中，通过《绪言》阐述了他对西欧哲学史的总体思考。他认为，哲学史不仅是人类的文明史（马克思语）、认识史（列宁语），而且是思想解放的历史。各时代的哲学都只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没有一个哲学派别具有绝对的终极真理的特权，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否定绝对的终极真理，就是肯定

人类思想的进步，否则就会停滞不前、死水一潭。这种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他在此书中还特别论述了思想解放的伟大战士布鲁诺，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战斗无神论。他们坚决地批判了宗教神学，提出了“烈焰（即暴力镇压）焚毁不了真理”，教父们鼓吹神学迷信，无非是打着神学旗号，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上帝的旨意，不过是教父的旨意，叫人们迷信他们的权威和地位。这些论述，很难不让读者联想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大搞类似的神学迷信和个人崇拜，是多么荒唐、多么愚蠢的历史大倒退。

在介绍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张学军高度评价了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论证了康德所发起的德国古典哲学革命，即重新恢复了形而上学作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第一哲学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哲学强调的人类理性统治世界的传统，突出论述了理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他吸收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合理成分，论述了感性认识不是单纯的感官直接获得的感性经验，而是先验的直观形式呈现的表象，因而是感官用时空形式构造表象的能力，简称为表象能力。知性认识，康德用自然科学的不容置疑的基本原理，论证为规则能力。即用逻辑概念和判断的先天形式，规定感性材料的联系和规则，因此，人为自然立法。理性认识，则运用概念和范畴，超出感性经验范围，作超验的先天综合推理，去探索最终原因和最高本体。康德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本性所决定的，它永远要追求本原，而又永远达不到。在人类认识的每一阶段，康德都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了理性统治世界的哲学传统。他认为，理性不是机械的服从自然，而是像法官一样，强制自然回答理性提出的问题。这种理性的理念，一方面能扩大知识，深入世界本身；另一方面，超验运用知性概念范畴，必然产生谬误——先验的假象，即二律背反。换句话说，理性用知性范畴去探讨超验的世界本体和最终原因，必然造成“纯理性的诡辩”，即关于本体问题的两种相反的命题，都是正确的。康德称之为理性的



“辩证法”。康德对理性辩证法的探讨，对哲学史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第一，它加深了人类对本体论的思考；第二，它揭露了理性的矛盾，为后来哲学探讨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辩证矛盾的普遍性开辟了道路，批判了旧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独断论的片面性。第三，它限定了人类知识的范围，使人类理智不致于陷入思辨空想，因此，康德提出，既要在经验范围内扩大知识，又要保留道德、宗教作为人类实践利益的理智前提及信仰基础。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神的启示、自然秩序、个人幸福和欲望等等，只能提供行为的明智准则，而不能成为道德法则的基础和源泉。道德法则的源泉和基础是人类理性的自由意志。他把卢梭的“人民主权说”政治原则，即自我立法又自我遵守的自由意志，改造成伦理道德的基础；反对封建神学的禁欲主义，也反对近代的功利主义，把人突出为世界的主体，人凭借自己理性的自由意志，按“善良意志”（即良心）和“应当”（即道德义务）去行动。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先天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即“绝对命令”，也是人的道德自律（意志自律）的最高原则。康德的实践理性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人以理性的自由为指导，不断追求自身的完善化，这样的道德法则，才对全人类整体普遍有效，因而，也是审核任何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的标准尺度。当然，康德的道德观还有许多弊端。

黑格尔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关于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能动性等观点，又克服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分割知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错误，发展了理性的辩证法等思想。

张学军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极“左”思潮在学术领域还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敢于打破极“左”思潮的桎梏，在《黑格尔哲学秘密初探》和《试探黑格尔辩证法的意蕴》等文章中，对黑格尔给予很高的评价。

张学军教授认为，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秘密问题，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的关键和钥匙。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众说纷纭。应该按照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去寻找这个秘密。黑格尔自己明确地说：“照我看来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为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①他还着重指出，“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精神现象学》通过对意识经由自我意识到精神的发展过程的描述，最终要证明，实体作为“意识的经验对象”的运动过程，即实体自我展开并“表明它自己本质上就是主体”的过程。

张学军教授对实体即主体这一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一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奥秘所在，是理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其整个体系的钥匙，实体即主体这一思想也就是绝对精神的“最高本质”（黑格尔语）。这是因为：第一，绝对精神（即真理），不是一种铸成的硬币，可随时拿来就用，而是一个过程及此过程的一切收获物的全部总和的整体。第二，人认识事物，不是把物搬入头脑中来，而仅仅是用概念来表述事物，即把事物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用概念表述出来。因此，离开概念就无法认识事物，而离开了事物概念就成为空壳。第三，理性的本能就在于把概念理解为事物的内在核心和真实本质。黑格尔说，理性的本性恰恰在于确信自身即是一自为存在，又把这种存在理解为现实呈现着的客观对象的实质。也就是说，理性能够认识，“它自身即是它的世界，它的世界即是它自身”。张学军教授认为，黑格尔在对精神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表现形态的考察中，不仅继承了十七八世纪以来伟大哲学家所达到的一些优秀成果，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能动性等，而且进一步试图解决被近代哲学所截然对立的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概念与事物的矛盾，并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找到出路，把实体与主体统一起来。不仅承认只有事物的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才能进入思维，而且思维也能深入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成为本质和规律的表现方式。这就有说服力地论证了只有客观实体（即世界实质、普遍本质和规律）才是作为主体的思维的真实内容，离开实体，主体就不成其为精神；同时，思维又能主动地深入自己的真实

^①恩格斯：《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